

## 明代权贵与戏曲发展关系之检讨

### ——以臧贤和郭勋为例

■ 丁淑梅 韦 强

**内容摘要:** 明代权贵之于戏曲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臧贤和郭勋分别是正德、嘉靖时期的权贵,他们分别编集了《盛世新声》、《雍熙乐府》两部价值很高的戏曲选集。虽然他们编集选集的动机,或是声色娱乐的需要,或是政治目的的需要,而且往往为戏曲注入浓烈的正统观念和颂圣思想,但是他们同时掌握着丰富的文献和人才,有利于编辑水平较高的戏曲选集;它们又拥有话语权以及改变风气的号召力、影响力,因此他们宣扬戏曲和“风雅”、“乐府”并列,也有助于戏曲摆脱俚俗小道的偏见。

**关键词:** 权贵 臧贤 郭勋 戏曲选集

中图分类号: J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943X(2015)03-0060-10

**Title:** A Comment on the Prestige Class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Xiqu: A Case Study on Zang Xian and Guo Xun

**Authors:** Ding Shumei, Wei Qiang

**Abstract:** The prestige class in the Ming Dynasty had an undeniabl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Xiqu in China. Zang Xian and Guo Xun, the two prestige figures during the reigns of Zhengde and Jiajing respectively compiled two valuable anthologies, *Sheng Shi Xin Sheng* and *Yong Xi Yue Fu*. Despite their entertainment and political motives, and despite the orthodox and eulogistic thoughts they imposed on the plays, they were in possession of a vast range of sources and could work closely with experts, which ensured the quality of these anthologies. Meanwhile, they also had controlled over the social discourse and were able to influence the cultural trends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e views on Xiqu as a vulgar and unrefined art were changed by their advocating for Xiqu as the rival to poetry of Fengya and poetry of Yuefu.

**Key Words:** prestige class; Zang Xian; Guo Xun; anthologies of Xiqu

DOI:10.13737/j.cnki.ta.2015.03.010

明代中前期,在民间戏曲相对沉寂、文人对戏曲关注有限的情况下,戏曲却在统治阶层那里获得了保留火种的空间。众所周知的是,藩王朱权、朱有燬都是戏曲理论家和戏曲作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权倾一时的权贵,也对戏曲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主持编集《盛世新声》、《雍熙乐府》的臧贤和郭勋,就是这样的人物。《盛世新声》、《雍熙乐府》分别刊刻于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最早的剧

曲、散曲合选选集。正德、嘉靖是明代戏曲发展的转折时期,是明代戏曲由低迷走向高潮的时期。而《盛世新声》、《雍熙乐府》的编订,正出于这个转折的起点,收集了大量元明剧曲、散曲乃至时曲,可看做是对嘉靖以前戏曲发展的资料总结。而编辑这两部书的臧贤和郭勋,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权贵。臧贤,正德年间曾任教坊司奉銮。他虽是伶人出身,最高官位也不过九品,但他曾经深得明武宗宠幸,权力极大,成为正德年间的一个著名权贵。郭勋则是贵族出身,袭爵武定侯,后又加封翊国公,是嘉靖朝势力很盛的权贵。两个权贵发起先声,编订戏曲选本,整集嘉靖以前的戏曲精华,为后来戏曲选本的编刊提供了一定的范式意义,也为戏曲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促动力,在明代戏曲史上拥有重要地位。以明代上层的戏曲文化好尚为背景,考察作为权贵的两位编者的戏曲活动与编选理念,可以厘清和进一步讨论明代权贵与戏曲发展之间的关系。

### 一、臧贤、郭勋与明代上层文化圈热衷戏曲的风尚

郭勋,生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卒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其五世祖郭英是明朝开国勋臣,于洪武十七年(1384)封武定侯。正德三年(1508),郭勋袭爵。袭爵之后,郭勋又历任两广总督、三千营、团营等军机要职。正德十五年(1520),明世宗即位。明世宗即位进京时,郭勋是警卫皇城的官员之一,初得信任。世宗继位不久,爆发了“大礼议”之争,世宗想尊生父为“皇考”,郭勋是明世宗坚定的支持者,更得世宗信任。嘉靖十八年(1539),郭勋被封翊国公,荣宠达到顶点。嘉靖二十年(1541),“给事中高时尽发勋奸利事,且言交通张延龄”,<sup>[1](P.3823)</sup>惹怒嘉靖帝,郭勋被逮捕入狱,次年死于狱中。作为嘉靖时期明世宗最为器重的宠臣之一,郭勋不仅在迎驾世宗时稳定皇城局势有功,在“大礼议”中更是世宗坚定的支持者,此外,世宗还委派郭勋参与营造慈宁宫、扈从顺天府等重要事项,可见其在朝堂之上的权力优渥与政治影响力。

臧贤,字愚之,别字良之。夏县人。正德三年(1508),武宗大招乐人,臧贤以伶人进。不久,他就结交权贵钱宁,获得武宗宠幸。正德六年(1511),升为教坊司奉銮。正德十三年(1518)他申请辞归,未获批准。而正是在此次辞归的前一年,他编辑了《盛世新声》。但是后来,他结交宁王朱宸濠谋反,在京城作为内应。“宸濠遣使厚遗之,……禁中动静莫不密报于濠。”<sup>[2](P.1843)</sup>正德十四年,宁王起兵失败,臧贤被捕。对于他的结局,一说死于狱中,一说被发配广西,钱宁惧怕臧贤连累自己,在其发配途中派人暗杀。臧贤的出身虽远不如郭勋,但得宠之时也是势位显赫。《国榷》载:

贤得幸于豹房,赏赉巨万,赐以飞鱼服。甲第奢僭,缙绅以贿进。尝奉命祠泰山,守令服谒,监司郊劳,不知为伶官也。<sup>[3](P.3151)</sup>

可见其虽身为伶官,但实际地位几乎与王侯无异。不仅可以代表皇帝行使祭祀之事,三司大臣都对他毕恭毕敬,权势不可谓不显赫。

臧贤和郭勋,都与明初的戏曲文化活动密切关系。臧贤是教坊司最高长官,作为宫廷戏曲的主管人,自然会接触和参与不少作为宫廷礼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戏曲演出活动。而郭勋也曾蓄养家班,雅好戏曲。他们对戏曲发展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分别主持编辑了《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臧贤和郭勋编辑两部戏曲选本,所显示的权贵参与戏曲的专业眼光和深度,说明在明代,权贵对于戏曲的关注,已经并非仅仅停留在欣赏、观看、创作的层面上。之所以如此,这和明代中前期皇室贵族

热衷戏曲的氛围和风尚有关。

虽然明王朝初立之时,就颁布了一些戏曲演出的限令,但是皇室集团自身,却对于戏曲演出极为热衷。正是为了满足戏曲创作和演出的需要,明初就相继设立了教坊司和钟鼓司。明成祖朱棣喜好戏曲,宠任杨景贤、汤舜民等词曲见长的文学侍臣。而宣宗、英宗、宪宗皆对戏曲兴趣十足,他们在位时,曾多次招募优伶艺人扩充钟鼓司。及至武宗,更是痴迷于戏曲,经常以观看戏曲为乐。所谓“上之所好,下必从之”。皇室对于戏曲的喜爱,必然也会波及到官僚,尤其是幸臣之中。有的幸臣正是通过戏曲博取君主欢心,进而受宠。正德年间权倾一时的太监刘瑾,就在钟鼓司以俳优表演取悦武宗。“瑾朝夕与其党八人者为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帝,帝狎之。”<sup>[4](P.5651)</sup>可见,通过戏曲和表演愉悦武宗,是成为获得武宗宠幸的重要方式之一。而臧贤同样是以伶人的身份获幸于武宗。所以,臧贤的得宠,首先得益于皇室尤其是皇帝对戏曲的痴迷。而无论是伶人还是宦官,为了荣华富贵就必须投皇帝之所好,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戏曲节目的编排、剧作的编创来取悦皇室,以求升进。

嘉靖皇帝明世宗虽鲜有关于热爱戏曲的明确记载,但是他却热衷于小说。他幼时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学者认为,嘉靖初年以官方名义相继刊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和世宗的倡导有关。而目前所知《水浒传》最早的刊本,是郭勋所刻的武定本。所以,郭勋当初刻《水浒传》,很可能也是为了投世宗之所好。而之后,他为了申请五世祖郭英进入太庙,又仿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模式,组织文人编写了《英烈传》,表现其祖上郭英开国之功。值得一提的是,郭勋不仅组织文人编写《英烈传》,而且组织家班的优伶在世宗面前排演,并最终打动了世宗。这说明虽不见明世宗对于戏曲态度的直接记载,但是他也是喜爱戏曲的。而郭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编写小说,编排演出,投皇帝之所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郭勋编辑《雍熙乐府》,亦是出于政治目的,为讨得明世宗欢心。他曾经将《雍熙乐府》献给世宗,世宗见首篇“国泰民安太平了”一句,“色动曰:太平岂有了时耶?”<sup>[5](P.218-219)</sup>要求郭勋把“了”字改为“好”。后来得知是仁宗喜爱之曲,才没有改。虽然未改,但可见郭勋献给嘉靖帝《雍熙乐府》,主要是为了投上所好,具有政治投机性。

所以,权贵关注戏曲、参与戏曲,和明代中前期皇室贵族对戏曲的热崇有关。皇帝、贵族热爱戏曲,因此不少官僚宦官若想取得权势或其他政治利益,就可以通过戏曲博取皇帝的欢心。臧贤以优伶身份获得武宗宠幸,郭勋以《雍熙乐府》讨好世宗,并通过编排《英烈传》促成政治目的,正是皇室崇爱戏曲、君臣上下勾连的必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臧贤、郭勋编辑戏曲选本,显然与朱权、朱有燾这样的藩王宗室参与戏曲创作的角度已很不同,这种权贵之于戏曲的互动关系,可能需要重新清理并加以检讨。

## 二、从权臣到罪臣——编者湮没与版本失录分析

《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虽然编集目的具有一定的政治投机性,但是它们收集了丰富的元明曲作,仍具有极大的价值和贡献。臧贤和郭勋分别是正德、嘉靖时期荣宠一时的权贵,虽然他们主持编集了两部选本,但是两部选本在流传过程中,编者的名字却湮没无闻。

现存最早的完整《盛世新声》刊本为正德十二年(1517)刊本,卷前有“盛世新声引”,但未署撰人。嘉靖四年(1525),张祿据《盛世新声》扩编而成《词林摘艳》,前有刘楫序言,称《盛世新声》编者乃

是梨园中人。而张祿自序,则只言“正德间,哀而辑之为卷”,并未提及编者。嘉靖时期,还有一个伪本《盛世新声》,乃《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之杂录,此本所题编者是“张祿”,显然是伪托。万历二十四年(1596)又有《盛世新声》的内府刻本刊印,同样不见编者的名字。可见,自嘉靖以后,《盛世新声》编者的名字就已经无存了。直到近代,福州龚氏大通楼藏有一种明刻本《盛世新声》,曲辞前刻有“樵仙戴贤愚之校正刊行”,学者经过考证,“戴贤”乃是“臧贤”的涂改,<sup>①</sup>至此才确证臧贤就是《盛世新声》的编者。据郑振铎先生推测,这个印有“臧贤”校正刊行的刊本,可能即为原刻本。因为这个刊本不仅印有编者名字,而且是现存刊本中唯一单独附有“万花集”的刊本,而在嘉靖年间《百川书志》之中,记载“万花集”附于《盛世新声》之后,可见这个刊本最符合原刊本的风貌。这个刊本刊刻年代不详,应当不会早于正德年间,但是它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原刊本印有臧贤的名字,但是及至正德十二年再次刊刻时,臧贤的名字已经抹去。

《雍熙乐府》的流传拥有同样的特点。《雍熙乐府》的版本主要有:嘉靖十年辛卯本(1531);嘉靖十九年庚子楚藩本(1540);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本(1566);万历年间“海西广氏编”本;清代许友绪配补抄本。其最为流行的刻本是嘉靖四十五年刻本,但是未题撰者。而对比其初刻本即嘉靖十年(1531)的刻本才发现,原刻本多出一篇序言。序言为春泉居士王言所作,云:“太傅武定侯苍岩郭公,当太平无事之时,偃武修文之日,遍阅宋元迨我朝文人所作词曲,采而辑之,凡二十卷,将锓梓以广其传,题曰《雍熙乐府》。”<sup>②</sup>其明明白白写着编者乃是郭勋。可见,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刻本有意去掉了此篇序言。

按照常理,两部选集价值很高,影响很大,加之编者的权贵身份,他们的名字理应流传后世,与选本共享殊荣才对,可是为什么偏偏湮没无闻,甚至需要后世学者考证,才能确认他们是两部选集的编者呢?其中主要的原因,或许与他们荣宠之时未能洁身自好,违法乱纪,以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政治命运和人生结局相关。

臧贤和郭勋获得荣宠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玩弄权术,迫害士人臣僚,干预司法伦常。郭勋曾经庇护妖人,陷害忠良。《名山藏》曾载:“郭勋者,贪婪纵不群也。……山西人张寅即妖人李福达也,以方往来勋家,其仇薛良首告之。巡按御史马录,录捕寅急,寅急求勋书为解。”<sup>[4](P.4415)</sup>后来郭勋勾结张璁等人,使得马录下狱,李福达反而无事。此外,郭勋常常苛扣军费,霸占庄田。户部尚书梁材弹劾他,反被罢官。而臧贤也曾帮助钱宁讥刺名臣杨一清,致使杨一清一度请退。

他们位高权重,其种种劣行,惹得朝野大臣十分震怒,纷纷弹劾。嘉靖时不少大臣抨击郭勋“赋性奸回,立心险诈,阿奉权贵,叨受天恩”<sup>[6](P.2425)</sup>、“中外皆知其为天下之大恶、朝廷之大蠹也”<sup>[6](P.2427)</sup>。四川御史谢瑜更把郭勋和严嵩等人并列为“四凶”。而对于臧贤,《明史》评论云:“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国事。一时宵人并起,钱宁以锦衣幸,臧贤以伶人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sup>[1](P.7875)</sup>可见,臧贤和钱宁等宠臣仰仗明武宗宠幸,为祸不小。

郭勋和臧贤虽然是红极一时的宠臣,但他们作恶乱为、触犯国法,不仅最终声誉败坏,而且也都因罪获刑而终。由此可知,正是因为他们从权臣最终变为罪臣,使得死后的刊本有意避讳他们的名字,导致他们的名字无法和两部选集一起流传后世。而名字的隐去,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对于两部戏曲选集的流传,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来以他们的权势,如果最终没有成为罪臣,无疑将使两

部选集获得更好的传播。但是他们成为罪臣之后,名字被隐去,致使印有二人名字的初刻本被边缘化,其他选本的传播也受到一定影响。据统计,明清两代的目录书中,记载《雍熙乐府》的多达15部,但是只有康熙年间《栋亭书目》著录“郭勋”,其余目录书中,皆不著“郭勋”的名字。《续文献通考》在“乐律”和“词曲”两部分著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楚藩刻本,一个是万历年间“海西广氏”本,《四库总目》著录的也是“海西广氏”本。《天一阁书目》、《八千楼书目》等著录的是嘉靖四十五年本,也无“郭勋”的名字。而著录《盛世新声》的目录书也全部没有“臧贤”的名字,《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都只是言“正德中人”编。可见,不仅在现实的版本流传中,印有“郭勋”、“臧贤”的版本被边缘化,即便目录书中也几乎不见二者名字,致使后人对印有二者名字的版本了无确知。

事实上,两个印有二者名字的初刻本,本身质量非常高。不仅编排完整,而且刻书也很精工。反倒是后出的版本,内容上与初刻本并无太大差异,编刻上不仅未对它们进行超越,反而多不如初刻本。比如《盛世新声》后来的版本,编排皆有一定问题,给人以杂凑之感:正德十二年本有的卷次印有“甲集”、“未集”,有的则未标;大部分卷次目录未标题目,“越调”卷却标有题目;而“万花集”干脆附于书尾,未做任何说明。而万历年间“海西广氏”编的《雍熙乐府》,则更是只有十三卷的节选本,然而此本却为《四库全目》所著录,以至于连王国维都误以为此本才是初刻本,令人唏嘘。所以,印有臧贤、郭勋名字的初刻本传播不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质量不高,也不是因为后世刻本对它们有什么超越,而很可能只是因为,流传过程中人们看到印有罪臣名字,即有意加以排斥。而后来的刻本和目录书干脆就把他们的名字隐去。初刻本被排斥,其他选本因为无编者姓名,也必然受到一定的轻视,导致无论初刻本还是后来刻本,都在传播中受到轻忽而至隐没。

明代正德、嘉靖时期,戏曲在一般上层社会还大多被视为俚俗小道,未能得到上层文化圈的普遍认同,此时两个权高位重的权臣贵族发起先声,主持编撰了两部大型的戏曲选本,这无疑对于明代戏曲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虽然两个选本无论是编集还是刊刻都具有很高的水准,可惜却因为编选者后来在政治上的身败名裂,其选本的传播也受到种种牵累,隐没在为人忽略的角落里,这不得不说是戏曲史上的一大憾事。

### 三、颂圣和祝寿——皇权思想覆盖下的编选理念

臧贤和郭勋的权贵身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编集《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的观念。这两部选集,体现了鲜明的皇家贵族和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它们的名字即直接表明立场,“盛世新声”标榜“盛世”,而“雍熙乐府”的“雍熙”之意,《雍熙乐府》嘉靖十年刊本,有春泉居士所作序:

窃惟雍和者也,熙亦和者也,是稽古唐虞雍熙是已。盖以上有尧舜之君,下有禹稷之臣,百度具新,四方风动,可为雍熙之世矣……有雍熙之世而无雍熙之曲,固不能鸣雍熙之盛,苟非雍熙之世而有雍熙之曲,讵能以享雍熙之福哉?今公当雍熙之世传雍熙之曲,是得以鸣雍熙之盛而享雍熙之福者,乃又不私所有,欲使天下之人皆歌雍熙之曲,而乐雍熙之化……以鸣国家太平之盛。<sup>③</sup>

可见无论是“盛世”还是“雍熙”,都具有宣扬太平盛世、颂扬歌舞升平之意。

从选本内容看,二者不仅收录大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曲辞,而且这些曲辞往往排列于每卷卷首。《盛世新声》十卷,有近六十篇以庆赏天下太平、祝赞皇朝圣明、歌舞宴饮娱乐为题材的曲辞,

占了总共曲辞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有六卷是以颂圣、庆赏的曲辞为篇首。《雍熙乐府》更甚,在前十五卷北曲当中,有十四卷是以颂圣曲辞为篇首,有的卷次甚至开篇连续两三篇都是祝颂、宴赏的曲辞。

这些颂圣、庆赏的曲辞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祝赞国家盛平、庆赏太平盛世。《雍熙乐府》全卷的开篇就是:“【醉花阴】国祚风和太平了,是处产灵芝瑞草,圣天子美臣僚,法正官清,百姓每都安乐。”<sup>④</sup>而这一篇曲辞,还被收录在《盛世新声》卷二的篇首。《雍熙乐府》卷二开篇的曲词则是:“【端正好】圣天子统华夷,际龙虎风云会,有贤臣宰辅扶持,八方宁靖干戈息,胜舜代过尧世。【滚绣球】保山河壮帝基,辅宽仁四海归,顺天心应垂祥瑞,千邦进万国来仪。”卷八为“【一枝花】皇都锦绣城,江左繁华地,累朝天子阙,万载帝王基,水秀山奇,百姓多豪贵,庄农禾稼齐,幸遇着盛世明时,端的是丰年稔岁。”这些曲辞也全部收录于《盛世新声》。这些曲辞多是文学侍臣或宫廷艺人所作,几乎都是华丽的辞藻阿谀太平盛世,大量堆积华丽的词汇,描写盛平的景象,艺术水准和内涵意义都不高,但是却占据显要的地位。

另一类庆赏曲辞是“宴飨祝寿”,也是体现了权贵立场和日常宴享生活。例如《雍熙乐府》卷四:“【村里迓鼓】则为圣皇眉寿,今日个百司同会,摆列着金枝玉叶,朝凤阙齐临丹陛,你看这鸾车凤辇,锦衣花帽,有他这豪贵,更那堪九卿排,三司列,六宰齐,是看这列虎贲簪纓大职。【元和令】贺长生延寿杯,蟠桃结九千岁,则愿的吾皇圣寿与天齐,万邦来皆进礼。”<sup>⑤</sup>又如《盛世新声》、《雍熙乐府》同时收录的:“【点绛唇】国泰隆昌,万民仰望,山河壮,圣寿无疆,玩赏在金銮上。……【寄生草】我则见金銮殿,列两行,文臣武将公卿相,赞吾皇稳坐蟠龙上。大明一统山河壮,寿绵绵永享锦封疆,奎星耿耿明天象。【尾声】万国尽来降,四海无征荡,大贤门用选俊良,普天下黎民朝圣王,永延年福寿双双,赞吾皇明主荣昌,举案齐眉进玉觞,摆列着稀奇异相,高擎着佳酿,则愿的圣明天子永无疆。”此类祝寿词,或是祝皇帝之寿,或是祝权臣之寿,其实和歌功颂德的曲词是一个系统,虽是以皇帝、权贵个人之寿为主,但最后还是要上升到祝赞国家之寿的高度。

这些歌功颂德、祝寿庆赏的曲辞在两部选集中占据重要篇幅,显然和臧贤、郭勋的权贵身份有着重要关系。他们受宠于皇帝,是统治阶层的官僚,自然而然要美化、歌颂他们统治的国家。不过,这些奉承歌赞的作品,只是华丽词语的堆积,鲜有艺术成就可言。而且,正德、嘉靖时期,流寇猖獗,藩王叛乱,也远非曲辞中歌颂的那样太平,所以这些曲辞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只是皇室贵族自我标榜、满足自己声色娱乐的工具而已。因此,权贵编辑的选集,收入大量价值不高的歌功颂德、宴飨祝寿之词,降低了其选本的含金量,这是臧贤、郭勋的权贵立场给予戏曲选集和戏曲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然,作为戏曲选集,《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也并非全部都是颂圣宴乐的曲辞,事实上,这两部选集的曲辞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其中,以其收录的杂剧为例,有从历史剧《气英布》、《苏武还乡》中选出的曲辞,有从《芙蓉亭》、《流红叶》等爱情剧中选出的曲辞,也有从《黄粱梦》等神仙道化剧中选出的曲辞。还有一些宣扬避世全身观念的曲辞,例如《七里滩》、《范蠡归湖》等剧作的曲辞。而《梧桐雨》、《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名剧也有大量选录。而从散曲看,两部选集也选录了大量民间爱情、文人隐逸、市井生活、讽刺嘲笑类的曲辞。总之,作为戏曲选集,《雍熙乐府》和《盛世新声》的选择题材还是很丰富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题材选择丰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标准:不能违反统治阶层的正统观念和伦理意识,不能涉及不利于统治的曲辞。这些题材中,爱情曲辞多属于皇帝贵妃、才

子佳人的爱情,不能涉及违反儒家伦理的爱情;历史剧都是咏赞忠臣良士,不能有赞美叛臣贼子的曲辞。而神仙道化和避世全身的曲词,旨在宣扬消极隐退的政治妥协思想,更不会对统治阶层构成威胁。所以,这些丰富的题材都是规限在强化皇室统治的思想意识之内。

所以,《盛世新声》、《雍熙乐府》的编选理念,具有浓厚明显的皇权和正统意识。首先,颂圣的作品是选集最为核心的构成,这些作品数量并非最多,但都安排在每卷的开篇或显要位置,以彰显其重要的地位。其次,贵族宴飨的题材占据很多篇幅,其实也是“颂圣”题材的一种延伸。最后,虽然也选有其他题材类型的作品,但无论从质还是量上,都不足以与皇权统治思想覆盖下的主导理念和编选体例相匹衡。

#### 四、权位之优养——臧贤、郭勋之于戏曲的积极影响

虽然从权臣到罪臣,让两部戏曲选集的传播受到影响。两部选集本身,也具有浓厚的皇家意识形态。但是臧贤和郭勋编集的两部选集,还是可以看出权贵对于戏曲的积极意义。事实上,从明初的藩王朱权、朱有燬即可看出,上层文化圈之于戏曲是有很大贡献的。朱有燬和朱权是明前期影响最大的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正是他们的创作和戏曲研究,维系了杂剧在明代前期的生机,保存了相当丰富的戏曲史料和文献。

相比于藩王,郭勋和臧贤没有创作能力,毕竟藩王往往从小会接受较为系统的文化教育,而臧贤乃一伶人,郭勋是武臣,文化素养有限。但是,他们也拥有和藩王一样的优势。首先,他们掌握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控制着大量戏曲专业人才。在明代中前期,戏曲文献主要保存在上层文化圈,而很多优伶、乐人也是由上层权贵蓄养,这就使得权贵掌握着文本和人才两个方面的戏曲资源,可以编纂、整合戏曲文献、剧目。其次,他们拥有较高的权位和声望,从而拥有话语权,这就使得他们倡导的理念,拥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这些优势,使得藩王没有涉猎曲选编纂之时,他们同样有能力填补空白,从而对戏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一)丰富的剧目来源与专业的编选眼光

在明代中前期,关于戏曲的书籍主要掌握在皇室贵族的手中。洪武初年,朱元璋为了宣教和控制藩王,赐予藩王词曲一千七百本。这说明在皇室之中,词曲、戏曲书籍数量惊人。而且当时,戏曲书籍也主要是在统治阶层流通。除了皇室贵族,掌握戏曲书籍的主要人群和机构,就是教坊司或内府。据现存杂剧数量最多的赵琦美《脉望馆古今杂剧》来看,其所存的242部作品当中,有95种是抄自内府本,其中大量剧本注明“教坊编演”,可知教坊司和内府存有大量戏曲剧本。所以,臧贤、郭勋这类权贵,在编纂选集时,拥有着天然的文献优势。臧贤是教坊司最高长官,所掌握的词曲剧本自不必说。郭勋虽然在戏曲剧本上没有优势,但是其家族累世藏书,也积累了大量的图书文献,而且以他的权势,也可以向皇室、内府索要文献资源。所以,他们在编纂戏曲选集时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众所周知,在臧懋循《元曲选》问世以前,收录杂剧的选集和总集都不多,只有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陈与郊《古名家杂剧选》和《脉望馆古今杂剧》等寥寥几种。而《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作为戏曲选集的先声,对比其他明代较早的戏曲集刊,可以发现它们保留了不少独有的作品,也可以发现它们确立了一定择取标准。

《盛世新声》中,收元杂剧 30 种,明杂剧 8 种。《雍熙乐府》收元杂剧 49 种,明杂剧 35 种。其中,有 28 种元杂剧和 8 种明杂剧是两部选集皆有的。而如果对比嘉靖、万历时期的重要杂剧选本《改定元贤传奇》、《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有 25 种元杂剧和 29 种明杂剧只见于《盛世新声》或《雍熙乐府》。其中,《流红叶》、《箭射双雕》、《芙蓉亭》、《贩茶船》、《叹骷髅》、《苏武还乡》、《谒鲁肃》、《栾巴喫酒》、《范蠡归湖》、《秦少游》、《海门张仲村乐堂》、《汉公卿衣锦还乡》等都是非常罕见的剧作。此外,作为明代前期创作数量最多的剧作家朱有燉的杂剧在永乐到正统年间是以单种刊本流传的。其最早结集的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杂剧十段锦》,收朱有燉杂剧 8 种。但是早在正德年间,《盛世新声》就收录了三种朱有燉杂剧的曲辞。而嘉靖十年的《雍熙乐府》,更是收录了多达 31 种朱有燉杂剧的曲辞,已经囊括了朱有燉所有现存的杂剧。由于朱有燉杂剧最开始是在内府流传,显然,臧贤和郭勋这种权贵,能够最早获得朱有燉最丰富的杂剧作品。可见,臧贤和郭勋掌握着极为丰富的元代戏曲文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部选本都为南曲专设一卷,收录的南曲多达 80 余套,不仅收录了《拜月亭》等经典戏文,还收录了《乐昌公主》、《王祥卧冰》、《唐伯亨因祸致福》等已经亡佚戏文的部分曲辞。这说明在明前期,南戏在民间一直盛行,甚至一定程度还影响到宫廷,否则这两部选本不可能为南曲专设一卷。两部选本在南戏不登大雅之堂的时代能够颇有眼界地专门开设一卷,保存了珍贵的南戏文献,同时也间接反映当时南戏的发展状态,这不得不说是件大功绩。没有臧贤、郭勋主持这两部选本,可能早期南戏的不少文献都会湮没无闻,后人也无法还原明代前中期南戏发展的真实历史。而在南戏还未壮大成为明代传奇并主流曲坛的时代,两个选本能够收录南曲 80 多套,也显示其对新起南戏的关注及其整集戏曲剧作与文献资源的眼光。

除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外,两部选集在择取作品的标准上也具有一定的榜样和示范意义。二者共收的《黄粱梦》、《梧桐雨》、《汉宫秋》、《丽堂春》、《两世姻缘》、《倩女离魂》以及《雍熙乐府》收录的《王粲登楼》、《扬州梦》、《金钱记》分别被后来的《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收录。二者共同收录的《气英布》、《范张鸡黍》、《虎头牌》等均被《元曲选》收录。而这些杂剧剧作,基本也都是元杂剧中的经典和上乘之作。这说明,两部戏曲选集不仅文献丰富,而且拥有专业的人才,能从各种文献中提炼出优秀的作品。毕竟,臧贤领导教坊司,而教坊司里必然拥有大量的戏曲人才。而从郭勋刊刻《水浒传》、编写《英烈传》以及组织伶人献演于嘉靖帝来看,其手下从事创作、表演的人才也相当多。

所以,权贵组织和收拢的门人和手下,具有较为专业的眼光,他们选择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水准。他们便利而直接地利用了内廷以及贵府所藏的珍稀文献,并加以裁汰、整合、收纳,最后编刊成集,为后来的戏曲辑录提供了一定的标准和范式。

总之,在万历以前,皇室和权贵掌握着丰富的戏曲文献资源,控制着大量戏曲专业人才,所以《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这样具有标志意义的戏曲选集,因为权贵或贵族的参与才终得以完成。虽然臧贤和郭勋的编集含有功利目的,但客观上对于元明戏曲文献、剧作的收集和整理都具有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二) 归大雅与小道之弃取

权贵介入戏曲和曲选,对于抬高戏曲地位、增加戏曲影响力也有积极影响。在元代,戏曲还是俚

俗小道,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到了明代,皇室和权贵却大力宣扬戏曲有助于国家世风的功用,把戏曲从仅仅供乡野村夫娱乐的功能,抬高到教化世人、裨益国家的高度,无疑是对戏曲地位的一次肯定。虽然皇室、权贵这么肯定戏曲的功用,是为自己声色娱乐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但是客观上,还是对戏曲摆脱俚俗小道的偏见起到了推助作用。早在明初,朱权、朱有燬这样的皇室贵族戏曲家,就鼓吹戏曲的宣教功能。朱权《太和正音谱》序云:“天下之治也久矣。礼乐之盛,声教之美,薄海内外,莫不咸被仁风于帝泽也,于今三十有余载矣。……夫礼乐虽出于人心,非人心之和,无以显礼乐之和;礼乐之和,自非太平之盛,无以致人心之和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sup>[7](P.29)</sup>他宣称戏曲具有“礼乐”、“国风”同样的作用,无疑是对戏曲地位的一次极大肯定。而臧贤和郭勋主编戏曲选本,同样是鼓吹戏曲教化人心、宣导民风的功用。虽然序言和引言并非他们亲自所写,但是无疑都是紧贴选本主旨、反映选本意志之言。“盛世新声引”云:“夫乐府之行,其来远矣。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传自汉唐宋,北曲由辽金元至我朝大备焉。皆出诗人之口,非桑间濮上之音,与风雅比兴相表里。”<sup>[8](P.7)</sup>它特别强调了戏曲绝非“桑间濮上之音”,而是“风雅比兴表里”。众所周知,“风雅”乃是儒家正统经典,而“桑间濮上之音”被认为淫乱之词。把戏曲从“桑间濮上之音”中划出,进而和“风雅”并列,无疑是认为戏曲和“风雅”一样具有宣教、感化的功能,是对戏曲地位的抬高。

除了把戏曲和“风雅”并列,肯定它有补于世的功用之外,《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还都强调戏曲乃是属于“乐府”的系统,对戏曲从形式上进行了肯定。在明代,“乐府”已经具有正统、高雅的内涵,朱权就曾把“乐府”和“俚歌”相对。《雍熙乐府》特意强调了戏曲乃是“乐府”系统,《雍熙乐府》春山序云:“夫乐府之名起于汉,是后代有作者,体制渐严。至于今日,独益精。斯乃文词之最工,声律之大备也。其体制有十七宫调……各从其属,一句之内不可乱下,一字一调之中不可混施。一曲自非高才博学,妙解音律者,不能按腔填词,使情明、语畅、稳谐。乐府何者,盖前人阅历既多,腔谱已定,声分平仄,字别阴阳,至精至备,本不可易。故于措词之间,其字其音,一有出入,即非家法,弗惬人心,何以传久远,被弦管哉!故此为词林之绝技,艺苑之至难也。文人才士往往难言之,求其究心精专,独臻其妙者,代不数人而已。”<sup>⑥</sup>把戏曲称之为“词林之绝迹,艺苑之至难”,宣称“文人才士往往难言之”,无疑是对戏曲地位的一次极大扭转。它不再是文人“不屑为之”的“小道”,而是文人“难为之”的“至难”,无疑是对戏曲地位的提升。

虽然《盛世新声》、《雍熙乐府》两个选本在主导观念上遵从和宣扬戏曲“归于大雅”,但从其选篇类型看,却并没有完全撇弃“俚俗小道”之作品。在两部选集里,俚俗之作虽存录不多,但是那些反映民间生活、世俗百态的作品还是有一部分被采录选入进来。在剧曲部分,两部选集收录了《鸳鸯冢》、《货郎担》、《魔合罗》等表现民间爱情、市井生活、世俗公案的杂剧,而收录的南戏作品《王祥卧冰》《唐伯亨因祸致福》等,主题上虽有道德训诫意味,角色声口、故事情味却也极具世俗气息。两部选集也收录了不少反映青楼歌妓生活和市井情爱的散曲,尤其在《雍熙乐府》中,这类作品甚至可以占到五分之一的比例。所以两个选本虽然在观念上把戏曲与“风雅”、“乐府”相比,一定程度提高了戏曲地位,但在具体选篇类型上又多少涵容了显露世俗气质的剧曲与散曲作品。可见,两个选本在有意识地将戏曲“归于大雅”的同时,对于戏曲的“小道”之作,尚持着有所弃、亦有所取的态度。这种较为博通的编选理念对于戏曲民间性特质的认识和包容,正显示了作为明代早期戏曲选本的编选者的

难能可贵之处。

所以,明代对戏曲地位的提升,皇室和权贵功不可没。他们把戏曲和“国风”、“乐府”并列,从内容、功用、形式上都给予极大的肯定,无疑提高了戏曲的地位和社会认知度。由于他们的身份,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必然很大,并且有利于扭转文人阶层的偏见。嘉靖、万历之后,大批文人迅速投入到戏曲选集、创作和评点之中,不得不说和权贵所倡导的风气有一定关系。与此同时,《盛世新声》、《雍熙乐府》也关注和容纳了戏曲的世俗性,在戏曲“归雅”的主导倾向中,也为戏曲之俚俗小道保留了容身的空间,使得戏曲来自民间的活泼的生命力得以保存。

### 结 语

以臧贤和郭勋编集的《盛世新声》、《雍熙乐府》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权贵之于戏曲,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的。虽然他们重视戏曲的动机,或是声色娱乐的需要,或是政治目的的需要,而且往往为戏曲注射浓烈的正统观念和统治思想,但是他们同时掌握着丰富的文献和人才,有利于编辑水平较高的戏曲选集;他们又拥有话语权以及改变风气的号召力、影响力,因此他们宣扬戏曲与“风雅”、“乐府”并列,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戏曲的品味和地位。而二者重雅而不避俗、剧曲散曲融通、雅俗兼收的选篇取则,也拓展了明代戏曲传播接受的疆域。明代权贵之于戏曲发展具有的积极推动作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和思考权贵的参与与戏曲发展之关系的问题。

#### ※ 注 释:

- ① 龚氏收藏此书,便怀疑“戴”字乃是“臧”字的涂改,之后黄缘芳、汪蔚林等人皆确认“戴贤”即“臧贤”。详见王钢、王永宽《〈盛世新声〉与臧贤:附说〈雍熙乐府〉与郭勋》(《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
- ②③ 转引自陈洛嘉《国家图书馆所藏辛卯本〈雍熙乐府〉考》,台湾《国家图书馆馆刊》2012年第1期,陈氏引自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十年刊本《雍熙乐府序》。
- ④ 引自双红堂藏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雍熙乐府》,(“双红堂”为日本著名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书斋名,缘自长泽规矩也的明宣德十年(1435)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崇祯本《新镌节义鸳鸯塚娇红记》,而小说《娇红记》一名《双红传》,后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
- ⑤⑥ 双红堂藏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雍熙乐府》。

#### ※ 参考文献:

- [1] (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 (清)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4] (明)何乔远.名山藏·宦者杂记[M].福州:福建省文史研究馆,1993.
- [5] (明)宋懋澄.九箴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6] (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C].合肥:黄山书社,2008.
- [8] (明)臧贤.盛世新声[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编辑部,1955.

(作者单位:丁淑梅,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韦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